

郑观应富强救国的思想与实践

朱碧恒

郑观应(1842—1921)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积极鼓吹君主立宪,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并且身体力行,成为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的鸿篇巨制《盛世危言》(1894)集中表达了他的启蒙思想。这部内容广博、立论新颖的著作,堪称 19 世纪下半叶的一部百科全书,当时曾“震动朝野”。据统计,此书的发行版本在 19 世纪末是最多的,不仅影响过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影响过孙中山、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非常喜欢《盛世危言》,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他是“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的情况下才读完这部书的。近年发现了毛泽东的一张借书条,上写:“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这封信是毛泽东在 1915 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家过节时所写的。可见当时他又重新再读这本书。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的毛泽东之所以爱读《盛世危言》,就在于这部著作具有现代精神,它所宣扬的富强救国在 20 世纪初仍有指导意义。

郑观应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之际。他诞生于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一生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封建王朝的衰败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引起了一批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看到民族危亡的现状,一心想寻找富国强兵之道。郑观应就属于这批把握到时代脉搏的先进人物。他出生于一个士大夫之家,由于他有九个兄弟和八个姐妹,家境不可能富裕,因此在“小试不第”,未能考上秀才之后,就遵从父命,放弃了仕宦之途,而走上商贾之道。1858 年,16 岁的郑观应便离开了家乡——广东中山县雍陌村,来到刚刚发展起来的大商埠——上海。他先在叔父的新德洋行,后在宝顺洋行谋生,开始了买办的生涯。正是在上海的洋行里,郑观应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打开了他的眼界,启迪了他的思路,逐渐形成了他的改良

主义。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他便在工作之余撰写文章,后来结集为《救时揭要》和《易言》出版,这是《盛世危言》的雏形。郑观应在 1885 年因杨桂轩事件被香港当局拘留达 4 个月之久,好不容易解脱后在澳门“杜门养痾”,潜心著述,用五年时间辑著成《盛世危言》。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终于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郑观应试图走富强救国之路,他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郑观应主张君主立宪,提出建立议院制。他认为中国贫弱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效法日、德、英、俄等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而法国大革命行动过激,产生的后果并不好。郑观应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立足点是振兴国家:“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①同时也是为了长治久安:“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②既然英、日等国都能实行议院制,而且甚有成效,那么,在中国,“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可不亟行哉?噫!慎矣!”^③近代史上,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实行议会政治的,郑观应是第一人。他指出:“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之下十居其六,君主之国,十居一二,民主之国十居二三。”^④所谓君民共主之国即君主立宪国家。他信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中国本来尊奉“民贵君轻”的思想,只是后来这一原则遭到了破坏。而通过议会的制约,君主便无法实行专制。凡国事,要由议院“询谋金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⑤。但他也不主张民权过重,而是要君民共主,“权得其平”。郑观应认为议院制是“西人立国之本”,论政于议院,能做到“君民一体,上下同心”^⑥郑观应介绍了西方三权鼎立学说:“查文明之国均有三权鼎立,各不相侵,立法一也,司法二也,行法三也。盖所立之法,由上、下议院酌定通过,呈报君主或总统,均表同意,批准颁行,方能作实,非一人可能自定。”^⑦郑观应提出要速立宪法,他心目中的议院,就行使立法权。尽管他的观点对立

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分不甚明确,而且有偏重君权的倾向,但是,这毕竟还是对君权的削弱。议院制是西方近代思想家实现民主共和而提出的国家根本体制之一,是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郑观应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体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观。

与议院制有关的是,议员和官吏必须实施公举制。郑观应反对清政府用保举法选拔官吏和“易地服官”的制度。保举法的弊端之一是贿赂徇私,选不到才德兼备之士。易地服官使为官者远离家乡,人地生疏,因与乡民休戚无关,于是肥瘦莫问。再一点是郑观应主张年老让贤和裁汰冗员。他说:“七十曰耄,精力就衰,艰巨难胜,恐有时因而误事,故奉身以退,避贤路、戒素餐也。”^⑧年老不退休对内政不利,他建议督抚以七十为限,司道以下以六十五为限。至于裁汰冗员,则指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节省开支。他说:“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廩禄之我,即多一腴民膏之人,甚且多一俄国是之人。”^⑨郑观应显然看到清政府中充斥年老体衰的官吏,机构臃肿的弊端。他的观点和现代社会的要求十分相近。

我国学者指出,郑观应提出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之时,朝野上下正热衷于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至多也只不过称道西方的议会制度,但并未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而且他们的见解都没有达到郑观应的思想高度。郑观应论议政的文章先收入《易言》中,发表于1880年,明确提出“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而在他之前,虽不乏介绍议院之人,却无一人敢于提出要在中国仿效。至于维新派虽也提出了设立议院,却在郑观应之后。尽管君主立宪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不符合历史的要求,但是议会以及公举官员、实行退休制和精简机构的思想却仍然具有生命力,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郑观应的政治主张是符合世界发展的总潮流的,体现了较多的民主倾向,有的甚至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具有较普遍的价值。

第二,在经济上,郑观应提出仿效西方的各种现代机构,如招商局(航运业)、工业和矿业、电报局、邮电局等,并提出与外国人进行商战。郑观应深知,若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郑观应是买办出身,但他同一般的买办不同,他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对外国人搜刮中国的财富,排挤中国人的利益甚感不平,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毅然离开了太古轮船公司,进入招商局。他离开了洋行是他生涯中的重要转折,如果说他写作《救时揭要》和《易言》时还只是纸上谈兵,自己的行动还没有跟上的话,那么,离开洋行既改变了他的身份,又开始将自己

的理论付诸实行。这是在1882年,郑观应时年40岁。此后40年,郑观应成了一个实业家,早年他曾投资公正轮船公司、生祥茶栈、扬州宝记、荣泰驳船公司和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如今他摆脱了买办的身份。说确切一点,郑观应还算不上真正的实业家,不错,他在不少民族工业中投入了数万资金,但这种投入显得较为分散,他不是专办一个企业的实业家。其实,他的主要身份只是一个经理而已,因为他主要在轮船招商局任职,他当过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帮办,只是其中的董事,股份极其有限(只有二百多股),他的顶头上司长期是督办盛宣怀。他还当过一段时期的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董、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些职务只属于高级职员,而并非他拥有这些实业,这些实业基本上都是官办的。因此,郑观应的身份还需要正名。从他大半生的经历来看,他已不是一个买办,也不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只不过是一个高级职员而已。长期以来戴在他头上的买办、资本家的帽子应该摘去。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一是他把发展工商业看作富强的基本手段。他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他把振工商看成富强的基础。西方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带来了新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引人注目。郑观应看到了这一点,诸如航运业、采矿业、冶炼业、修铁路、邮电通讯等等都是他所关心的,认为必须大力加以兴办,这是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必不可少的一步,否则就会越来越落后,最后被列强所吞并和瓜分。

二是他把工商业的发展看成要进行一场“商战”。他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说:“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⑩他概括自己的经历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他在洋行看到并熟悉了洋人如何与中国人进行商战的一套方法和本领,一旦来到中国人自己办的企业中,他的主要目标便是与洋人展开商战,因为当时外国人的公司占据了大比例的营业额,对中国企业构成极大的威胁。他懂得利用主权与外国人周旋,上任伊始便同太古轮船公司等商定营业额的分配,争回应得的权利。1882年他任招商局帮办后,立即与怡和、太古公司交涉和谈判,签订了“齐价合同”。1892年他再次进入招商局,又马上同怡和、太古两公司重新达成协议,排除了外国公司以非法竞争的手段压垮招商局的可能,取得了商战的节节胜利。

三是郑观应重视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他强调人才的寻觅和启用。他认识到人才是商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他说：“商战须从学问上讲求，既需船械，要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识驾驶。所谓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也。”推而广之，郑观应认为在天学、地学、人学三方面，即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应搜罗人才，这样才能有益于国计民生。在找不到适合的国内人才时，他则主张聘用外国专家。在用人方面，他主张任人唯贤，赏罚分明，这样才能除弊振兴，提高工作效率。其次郑观应注重设备的先进、成本的计算和调查研究。他要换掉吃水深，耗煤多、装载少的船，改装船只。他看到大冶有铁无煤的不利条件，感到在汉阳兴办冶铁厂不理想。他精于成本的计算，也就是精于经营之道。每次重新上任之后，他总是沿长江各口岸去调查一番，发现问题，了解到太古等轮船公司如何招揽生意，然后责令各地仿效，或设法加以弥补和改枕。因此他短期内便能改变不利局面，扭亏为盈。他还主张购买与自造机器并重，否则永远步人后尘，过一段时期买来的机器便又落后了。

四是郑观应还提出兴办银行和降低税收。他认识到银行“为百业总枢”，旧式钱庄远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他指出：“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⑩他明了银行能解决商品流通和生产中资本短缺的问题。他在实际经营中看到洋货和国货在税收上的不平等，洋货可平沽，而国货则税重，做法这样颠倒，“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他向政府提出让纺织品“概免抽厘”，以保护商民，并在一定年限内不准他人再设纺织厂，以抵制外国商品侵入。他主张必须收回海关，因为主持海关的洋人处处袒护洋商，刁难华商。

五是郑观应主张商业要民办而不是官办。他有保留地同意“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清政府的官督不是护商而是害商，使企业变得如同衙门。官办的弊端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⑪因而他主张商办：“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⑫郑观应不仅认为轻工业商办为宜，而且认为重工业也应商办。甲午战争以后他又重提招商承办的主张。究竟官办还是商办，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决定的经济问题，有的如美国，飞机制造业是商办的，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在法国则是官办的。银行业往往是官办与商办并举，在美国似以商办为主。但总的说来，轻工业通常

以商办为主。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官办的弊端显而易见，主要是官僚习气、人浮于事、贪污贿赂、任人唯亲等难以革除。可是郑观应的商办呼吁无法实现。

郑观应的经济活动和主张处处从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出发，他的观点以西方的经济体制为依据。我国学者认为郑观应关于商战的体系是相当完整的。他的经济思想是他的改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单单着眼于政治改良，他还着眼于经济改革，两者相辅相成。由于郑观应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他首先是个实践者，在工商业的第一线上担当重要职务，因此他总是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他不仅仅从局部出发，还能从全局考虑，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指归。毫无疑问，郑观应是在观察到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才引进西方发展工商业的现代方法，实际上他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观点往往得到洋务派官员的赏识，虽然他们未必都采用他的观点行事。而且洋务派官员兴办实业的目的和郑观应并不一致，他们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受制于官场斗争。郑观应在政治上无权，他只能出主意，提方案。很明显，他的观点超越了洋务派的主张，在当时条件下大多是无法实行的。有的要到 20 世纪下半叶才成为现实，由此可见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是常新的，他关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是一场商战、企业管理的方法、保护民族工业、发挥民办工商业的积极性等思想，至今仍具有宝贵的价值。

第三，在郑观应的思想中，教育问题占据重要地位。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是“强于学，非强于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他还说：“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他指出西方国家“士有格致之学，工商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分门别类，有利于学科的深入发展。他反对把教育大权交到洋人手上，主张学校要开设“天球、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言语、政事、律例”等包罗各门学科，让学生掌握现代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总之，郑观应将教育看作实现国家强盛的保证和根基。近代西方把教育置于重要地位，就是基于为国家提供人才的考虑。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最早倡导建立西方近代学制的是郑观应。西方近代学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是近代工业革命对劳动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直接反应。因此，在 19 世纪后 30 年就倡导建立近代学制无疑是超前的。郑观应认为必须设立增减新式人才的学校和废除科举制度。他指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

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¹⁸又说:“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¹⁹他相信实施新的教育体制数年之后,便会人才济济。郑观应建议在州、县设立小学,在县、府设立中学,在京都设立大学,分级递进,上下衔接,每科分为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三年后选择优秀者定为秀才、举人、进士。尽管他还没有摆脱旧的求取功名的思想,但是他的设想已经具备分班授课、有固定年限、通过考试升级、分三年一次衔接的近代学制雏形。在郑观应之前,李提摩太等曾介绍过西方学制,但只有郑观应把西方教育体制与中国教育联系起来,提出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有学者认为郑观应的言论是后来百日维新“变科举、兴学校”的直接来源。废科举,办学校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1902年张之洞主持制定《壬寅学制》,次年又修改颁行了《癸卯学制》,也受到了郑观应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关于学制的设想,与他在《公车上书》中所提的主张相差甚远,而与郑观应的倡议更接近。郑观应在1880年左右已提出创立“机器书院”,他在1896至1897年总办汉阳铁厂期间,深感技术人才不足,曾建议开办一个结合机器生产的大学堂,学生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拟定了章程6条,招收40名学生,20名学熔炼,兼学化学;20名学机器、绘图等,待有了成效,便可开设矿务学堂。他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朽之伟业”²⁰。郑观应还主张派遣有实际经验的工匠到外国机器厂去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提出变书院为学堂的也是郑观应。他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使之有学校之实”,教授有实用价值的课程,文科教文学、政事、语言、格致、艺学、杂学六门,武科分陆军和海军,分别授以专门科目。这个主张后来成为百日维新的依据。光绪皇帝下达谕令:“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的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谕令中提及的章程,是梁启超草拟的,将郑观应的主张“照单全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郑观应在《女教》中论证了女子受教育的合理和有益,从而导致他的朋友经元善1896年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

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便对教育十分重视。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抨击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主张培养掌握全面知识的人才。教育制度的完善至19世纪初已得到确立。教育是新旧思想产生直接碰撞的领域,在社会的转型期,新旧观念的斗争总是在教育领域进行。新的教育体制的出现和确立,标志着新思想新制度的胜利和建成。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对于资本主

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人才。郑观应基本上根据西方教育模式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方案,大体上是能照搬到中国来的,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西方教育体制的优点表现在按照人的幼年、少年和青年三个时期,分段进行教育;面向社会发展,注重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教育的高级阶段,分成专业,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力求实现男女平等观念,主张女子教育,等等。这种教育体制显然远远高于私塾制和书院制,中国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必然要采用现代的教育体制。郑观应比当时的教育家略胜一筹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教育与立国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改良方案中,君主立宪(议院)—经济改革—教育改革是三位一体,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核心。把教育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看,是与洋务派、维新派迥异的。郑观应对教育的看法,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有现实意义。

郑观应的改良方案虽然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思想已经不合时宜(如君主立宪),但是,他的思想的许多方面并没有过时,他的方案大部分已经陆续变成现实。其中一部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可能在中国实行,例如他的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面向世界、如何对待外资、怎样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专家、购买外国产品与自己制造的关系、企业如何经营管理、怎样选拔和培养人才等等,大部分适用于改革开放时期,由此可见郑观应的预见性。郑观应不愧为我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先行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他的思想和历史功绩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

①《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下册第11页。

②③④⑤《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4页、315页、314—315页、311页。

⑥《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⑦《致伍秩庸侍郎书》,《郑观应集》下册第320页。

⑧《限仕》,《郑观应集》上册第453页。

⑨《汰冗》,《郑观应集》上册第457页。

⑩《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⑪《银行上》,《郑观应集》上册第682页。

⑫⑬《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12页、第612页。

⑭《学校》,《郑观应集》上册第261页。

⑮《西学》附录,《郑观应集》上册第280页。

⑯《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